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丛刊

-53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4

封面设计：何礼蔚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

第 六 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51,000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800册

书号：10078·3218 定价：1.00元

目 录

忆社联..... 许涤新 (1)

中国社会科学界联盟成立史话..... 丁景唐 (10)

社联
史料

中国社会科学界联盟纲领..... 18

联盟记事..... 20

左翼剧联成立前的几件史料..... 赵铭彝 (25)

三十年代左翼戏剧运动及其它..... 凌 鹤 (39)

剧联影评战线的回忆片断..... 鲁 思 (50)

电通影业公司始末记..... 周伯勋 (70)

剧联门外听“鼓声”..... 吴似鸿 (79)

左联盟员谈左联(续)

.....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资料组辑 (84)

丁 玲(84) 王若望(85) 刘芳松(86)

孙席珍(87) 李文甫(88) 李俊民(89)

吴奚如(91) 张松如(91) 徐 盈(92)

郭维城(93) 韩劲风(94) 楼适夷(95)

雷减波(95) 潘应人(97)

左联琐忆及其它…………… 关 露 (99)

回忆北平左联…………… 陈北鸥 (104)

我与《文艺新闻》的一段因缘…………… 于 海 (111)

本军抗战阵亡将校题名录书端…………… 陈 毅 (116)

记韩紫石先生…………… 陈 毅 (119)

陈毅同志两篇短文附记…………… 陈昊苏 (122)

陈毅文学系年…………… 孙文光 (124)

忆陈毅同志与父亲郑振铎的交往…………… 郑尔康 (171)

我在仰光的时候…………… 艾 芜 (174)

——兼记万慧法师

梦里依稀忆故巢…………… 萧 军 (192)

——上海拉都路的故址和三张画片

诗人徐雉的革命生涯片断…………… 徐雪寒 (209)

终生的憾事…………… 田仲济 (213)

——回忆《王统照文集》的编辑与散失

现代小说家书简…………… 赵景深辑注 (217)

——现代作家书简之一

叶紫日记…………… 郑赤辑注 (235)

茅盾著译书目…………… 魏绍昌 徐恭时 翟同泰编 (291)

丁玲书目…………… 叶孝慎 姚明强编 (314)

张天翼著作目录…………… 朱金顺编 (326)

信
稿
摘
编

- 《“夜来香”》是鲁迅佚文吗?.....陈福康 (332)
《自然底追怀》的写作时间及其它.....陈永志 (337)
关于《郭沫若著译书目》书简一束.....朱树人等 (339)

· 补 白 ·

- 鲁迅在上海的第一个活动地点.....陈朝华 (313)
郭沫若作儿歌.....丁言昭 (115)
胡也频的笔名.....曹 新 (191)
胡也频曾在《世界日报》发表诗作
.....王锦厚 伍加伦 钟德慧 (325)
话剧运动零拾.....闻 操
“保罗”的得名(17) 在《乱钟》声中(24) 大道剧社和《马迪
加》(38) 稿费、银簪及其它(49) 《放下你的鞭子》(98)
《合作之“末”》(103) 洪深和戏剧协社的“男扮女装”(110)
“摩登社”名考(118) 学校剧运动(331) 应景剧(344)
《蒲风遗著索引》补.....郑树荣 (123)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将于一九八一年
起陆续出版.....张晓萃 (121)

忆 社 联

许 涤 新

社联的全称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它是左联的姊妹团体。左联成立于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当时参加左联的成员并不限于作家和文艺批判家；有不少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革命学者，如朱镜我、杜国庠（当时化名林伯修、吴念慈等）、彭康、李一氓、熊德山、吴亮平、邓初民、柯柏年、何思敬、王学文、周新民、宁敦五、杨贤江（当时化名柳岛生）钱亦石、张庆孚等同志，也参加了左联。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同志，根据党的决定，后来又建立了社联。社联成立的日期，是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日，比左联迟两个多月。社联第一任党团书记是朱镜我同志，党团成员有杜国庠、王学文、刘芝明等同志，与此同时，还陆续成立了剧联、教联、电协、集纳等八个革命团体。而领导左联、社联和剧联等革命文化团体的文总（全称是左翼文化总同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总的领导核心则是党的文委（全称文化工作委员会）。

社联为了培养年轻的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年的冬季，曾设立了一个叫做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的组织。据王学文同志的回忆，社研是以创造社傅克兴等人到组织的“问学社”为基础的。社研的第一任党团书记是王学文同志，党团成员

有朱理治等同志。社研成立后，在青年中推广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起了可喜的作用，但和社联的工作有点重复，领导力量有点分散。于是，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社研并入社联。

社联的基层组织，是交通、复旦、劳动、大夏、光华等大学的小组和闸北、小沙渡、杨树浦一带工厂中的工人读书班。据我的记忆，在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五年初，上海社联的盟员约五百多人。在这五百多人中，知识分子占一半以上；工人成分的盟员不到一半。参加社联的工人盟员，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国民党和资本家的压迫中，表现得极其英勇。一九三四年美亚丝织厂的罢工斗争中，就是如此。有些工人盟员在党的长期教育和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成为党的优秀干部。解放后在上海任市工业局副局长的王公道同志（原为皮鞋工人）和在广州任副市长的孙乐毅同志（原为汽车司机），便是工人会员的优秀代表人物。

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不少社联的盟员参加了，重点批判了托陈取消派抹杀中国的半封建社会性质，而硬说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提法。特别是由朱镜我同志任总编的《新思潮》杂志，对于托派（任曙和严灵峰为代表）的反动提法，给予沉重的打击。参加《新思潮》杂志的朱镜我和王学文等同志，在论战中强调中国具有半殖民地性质，曾受到当时学术界的重视。在哲学战线方面，叛徒叶青（任卓萱），为了反革命的需要，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极尽其篡改、曲解和破坏的能事。当时主编《读书生活》的艾思奇同志（社联研究部部长），用深刻谨严、生动活泼的文章，给叶青的反动言论以沉重的打击，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做出了贡献。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卖国政策，社联在白色恐怖之下，在出版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主办了许多刊物。由柯柏年同志（“九一八”到“一二八”间任社联宣传部

长)主编的《研究》(社联机关刊物),在一九三二年初出版,只出一期便被封闭。社联还出版了另一个机关报——《新文化》月刊,由沈志远主编,出版两期后也被查封;由许涤新主编的《社会现象》周刊,也是社联领导的刊物,经常代表社联来审阅稿子的是杜国庠同志,第一期是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出至第七期被查封。

文委在左联主办的《文艺新闻》遭到封闭(一九三一年)之后,出版了一个综合性的刊物——《社会生活周刊》,由夏衍和楼适夷两同志代表左联、由蔡馥生同志代表社联组成编辑小组,出版十二、三期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所封闭。在《社会生活周刊》停刊之后,文委又出版一个综合性的月刊——《正路》。这个刊物由张耀华(社联盟员)出面主编,蔡馥生任副主编,参加写作的有杜国庠(笔名林素庵)、艾思奇、马纯古和许涤新等人,只出版两期,又被查封。

从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起,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文委及其领导下的各个革命文化团体,要出版自己的机关刊物,困难极多。于是我们便利用公开合法的刊物来发表文章了。艾思奇以“李东明”的笔名,在《中华月报》上发表哲学文章。张耀华、许涤新、钱亦石和邓拓等同志,利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和中华书局的《新中华》半月刊,发表一系列有关中国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文章(大约从一九三三到一九三五年间)。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我们揭露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一天比一天严重;在国际问题方面,我们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和希特勒夺得德国政权后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等问题。《东方杂志》是旧中国资格最老的杂志,影响相当大;《新中华》的资格虽然不那末老,但销路也相当稳定。它们都是在国民党政府登记的合法刊物。但,它们是中间

性质的刊物，与国民党的机关报有着区别。在当时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利用这种合法刊物来发表我们的文章，可以把我们的政见传播到全国各省市去，这是一种比较巧妙的斗争方式。《东方杂志》敢于发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国际问题和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要感谢胡愈之（当过《东方杂志》总编辑）和张孟养（《东方杂志》实际负责编辑的进步朋友，解放后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了）两同志！胡愈之任主编不久，因为敢于改革，面貌一新，每期都有几篇进步文章，不到一年便被老板王云五解雇了。接替他的是后来当了汉奸的李圣五。但编辑部里还有一些进步人士，张孟养就是一个。《新中华》杂志敢于发表左翼文章，则要归功于钱亦石同志。当时该杂志主持实际业务的是周伯棣先生，钱之参加编辑工作是由周引进的。钱去后便有计划地组织左翼同志的文章。

一九三三年八、九月间，世界反帝大同盟来上海召开会议，当时领衔来上海主持这个会议的是法国文豪巴比塞；后因巴比塞目标太大，阻力太大，未能成行，改由英国的进步人士马莱爵士代替，筹备工作首由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刘芝明同志负责，但工作才着手的时候，刘等便被捕；乃由社联的党团书记史一乘和张耀华两同志接替刘的筹备工作，并由张担任大会秘书长。筹备会经常在张的住所召开，不久突遭破坏，当场被捕的有十二个同志（包括史一乘、张耀华二人，而蔡馥生同志是在次日去找张谈工作被捕的）。组织又派左联楼适夷同志负责筹备，又被捕。为了筹备召开反帝大会而被捕的三批同志都送到南京伪中央监狱去坐牢了。但是，这个会议，由于得到孙夫人宋庆龄先生的帮助，终于在白色恐怖的上海，胜利地举行并圆满地结束了。

社联盟员在马列主义理论上，造诣最深的，当推胡乔木同志，其次是艾思奇同志。乔木同志的理论成就，他为党所做的贡献，是大家所熟悉的。艾思奇同志的著作——《大众哲学》，在一

九三五一三七年救亡运动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还要提到杜国庠同志，他在日本京都帝大学习政治经济学，民国初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当经济学教授，但不久便致力于中国哲学之研究。直到现在，我还感谢他在一九三一年间，经常出席我们的社联小组活动。他叫我们这个小组要精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并且精辟地为我们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左联五烈士的牺牲，不但震动了全国，而且激起了全世界各国进步人士的愤慨；社联呢，为中国革命而献出了生命的烈士也有好几位：

（一）朱镜我同志是创造社后期成员，是社联的第一任党团书记，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他同黄文杰（一九三四年冬至一九三五年春间任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杜国庠、阳翰笙、田汉和许涤新（杜、阳、田和许都是那时党的文委工作委员会委员），同时被捕。文杰和镜我同志坚贞不屈，被国民党投入南京伪中央监狱。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国民党被迫无条件把他们释放。新四军成立后，朱担任军部的宣传部长。皖南事变时，他早已患了严重的胃病（很可能是胃癌），组织派两名战士用担架帮助他转移。敌人的追兵迫近的时候，他坚决地命两位战士急速离开，而自己从高山跳下，壮烈牺牲！

（二）刘芝明同志对社联和社研的建立，做了不少工作。当时他的化名是“陈麻子”。一九三三年初调离社联去负责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工作，不久被捕，被关在南京伪中央监狱；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被迫无条件把他释放。恢复自由之后，他到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工作；解放后，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他被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的打手们毒打致死！国民党的军统、中统，没有完成的这一反动任务，竟由林彪、陈伯达、“四人帮”来完成了！

(三)何思敬同志是社联的发起人之一。国民党的几个元老，屡劝他去做官，均遭拒绝。他甘心过着清苦的教授生活。一九三五到三六年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出版了《世界大势》杂志，成为华南的一支火炬。后来参加“东江纵队”的许多干部，在不同程度上是受到何老的影响的。他是法学家，又是一位哲学家。一九四六年国共谈判时，他是中共代表团的顾问之一。这位为真理奋斗一生的老学者，竟在十年浩劫中，惨死于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的毒手！

(四)何云同志(原名朱士翘)，浙江人。青年时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在留日期间即参加革命活动。三十年代初，回到上海，参加社联，并在社联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即负责社联的领导工作。一九三二年夏间他因参加在上海共舞台召开的反帝群众大会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判处无期徒刑，在南京伪中央监狱执行。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何云同志因而得释，出狱后即恢复了党籍。他同陈同生同志合办了一个小报《金陵日报》，宣传抗战，不到两个月，因经费无着，只好停办。何云组织了一个宣传队，沿着长江唱歌、演戏、报告，徒步到了武汉。他到长江局接上组织关系，被派到正在筹备的党报——《新华日报》，从此我又同他在一个机关工作了。

《新华日报》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出版，何云同志负责国际版。当时高居长江局书记的王明(陈绍禹)，对《新华日报》的所谓“领导”，实在使人不能忍受。他对国民党蒋介石几乎拜倒在地，而对《新华日报》的干部却实行了无上权威的家长制。他同小孟(孟庆树，他的老婆)几乎每个礼拜要登一次启事(我们称之为“政治广告”)，只要他的“政治广告”错一个字，整个编辑部的同志，就都要挨骂！何云同志每次从长江局讨论《新华日报》的会议回来以后，就问我：“你看这个大人物的表演如何？”我说“当

然相当精彩。”我们经常在下班后找个小馆子暗骂王明，他力劝我下决心到华北去抗战，那就可以看不见这个大人物的难看的脸色。我说：“还是等组织的决定吧”，结果在武汉快撤退前几天，我同老何分手了。我去重庆，他到华北敌后。这一别，就永隔死生了！

他到华北敌后，担任太行新华分社的主任，艰苦奋斗，使人钦佩！大约是一九四四年，报社被日本强盗包围了，他镇定地把干部分几路撤退；而自己和少数几位同志，坚持到最后。当敌人的包围圈缩小之后，他带队突围，敌人用密集的炮火，对着他们几个扫射。何云同志就在敌人的密集的子弹之下，为党、为民族，流尽了他的鲜血！

（五）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我担任社联的党团书记；一九三四年初，又被调到文委并负责文总的组织工作。马纯古同志，接替我的社联党团书记的职务。没有几个月，上海中央局调纯古同志到全国总工会工作。从那个时候起，直到去年他逝世的四十五年间，马纯古把他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中国的工人运动了。接替纯古同志任社联书记的是陈处泰同志；他是一位江湖义气的人物，一九三三年间因示威被捕。在租界的监狱里，他认识了几个反蒋的暗杀分子，谈得投机，交了朋友。一九三五年冬，国民党在南京开伪三中全会，陈的一位朋友，化装成摄影记者，要暗杀蒋、汪，但蒋没出席。当他举枪要杀汪时，被宪兵逮捕，这批在上海的暗杀分子的住处都被查抄。陈因找他的朋友也被捕，并于次年初在南京遭枪杀。陈热心于搞暗杀，在政治上并不是正确的斗争手段，但陈在监狱中受到敌人的残酷拷打，两腿被打断，却毅然决然，视死如归，那是值得尊敬的！

（六）邓拓同志参加社联时化名为邓云特，一九三四年间在《中山文化季刊》发表过关于中国社会史性质的文章，也在《东方杂志》发表过关于中国农业和粮食问题的文章。在解放战争期

间，担任《晋绥日报》社长；北平解放后，任《人民日报》社长。一九六六年他同吴晗、廖沫沙二同志，被林彪、“四人帮”和那位无恶不作的“顾问”康生指为所谓“三家村”，作为十年浩劫的第一幕而被迫害致死！他逃过了国民党军统、中统的逮捕，但逃不出林彪、“四人帮”和康生的白色恐怖！有谁能想得到呢？

（七）陈同生同志，原名陈侬菲。他参加过一九二七年冬的广州起义，在海陆丰战斗了一个时期，由于身犯重病，组织叫他到上海治疗。在三十年代初，他曾在社联负责党团的组织工作，一九三三年夏调至全国救济总会（简称济总）担任党团书记。一九三四年冬被捕，关在南京的伪中央监狱；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被迫无条件地把他释放。陈到新四军某团负责政治工作。他机智勇敢，工作做得相当活跃。话剧《东进序曲》中的政委，就是以他作为模特儿的。田汉同志在看了这出戏之后，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有“从容兵火忆侬菲”之句。同生同志知道江青在上海滩上三十年代的丑秽生活及其政治上投降敌人、在蒋贼五十岁时演戏献媚的无耻行径；江青也知道陈同生同志对她的那一段不可告人的秽史有所“了解”。一九六七年反革命的上海一月风暴一开始，同生同志便遭到“四人帮”的凶狠的走狗们的残酷毒打，含冤而死！江青及其帮凶又完成了国民党特务没有完成的杀人任务！真是“何其毒也”！

（八）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长期在上海任副市长的曹荻秋同志，也曾在社联担任领导工作，后来投笔从戎，拿起枪杆同日本侵略者在苏北、苏中一带周旋。反革命的一月风暴爆发之后，他同陈丕显、魏文伯等同志一道，失去了自由，天天挨斗、挨打，长期的折磨，使他在牛棚放出来之后不久，就死去了！

（九）张庆孚同志，三十年代初，任上海法政大学和暨南大学的教授，著有《国际问题》一书。他也是社联的发起人之一。大

约于“九一八”到“一二八”间任社联党团书记。解放后任农业部副部长。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文革”一开始，在林彪、“四人帮”打手的围攻鞭打中，心脏破裂，死于非命！

如同左联和其他革命文化团体一样，社联也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无畏地战斗着。值得我们自豪的是，中国的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所吓倒。社联虽然也出了不齿于人类的叛徒，如“一二八”时期曾任社联党团书记的郑彰群，外号张光头，一被捕，就叛变，后来竟成为军统特务郑介民的狗头军师；但作为一个组织，作为盟员的整体来说，社联是经受了考验的。

一九三六年社联在组织上虽然被解散了，但是社联的盟员，经过十年内战考验的盟员，经过被捕坐牢考验的盟员，在八年抗战中，在解放战争中，在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为了祖国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继续意气风发地百折不挠地在奋斗着。可恨的是十年浩劫期间，当年在白色恐怖中战斗过来的社联战士如刘芝明、邓拓、陈同生和曹荻秋等同志，在长期的残酷折磨之下，含恨离开了人世。林彪“四人帮”之残害革命者，同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相比，使人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青出于蓝。凡是有一点爱国心的人，哪个不痛恨林彪、“四人帮”对中国社会科学家的残酷迫害呢？死的死了，残废的残废了！每念及此，我是没法压抑住满腔悲愤的！使我感到庆幸的是，经受过十年浩劫而幸存下来的好多位社联同志，如胡乔木、李一氓、柯柏年、史一乘、汪道涵、徐扬（现在湖北建委工作）、郑伯克、蔡馥生、李凡夫、李剑华等，虽然年过七旬，或年近七旬，还能抖擞精神，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为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尽力。我们一定要继续奋斗，以此告慰九泉之下的战友。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广州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史话

丁 景 唐

半个世纪前，在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化和左翼文艺运动，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了光辉的功绩。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是最早成立的两个并肩作战的革命文化团体。以后，又相继成立了剧联、美联等几个革命文化团体，组成了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领导下的左翼文化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八大盟”（有的是小组）。党内则由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统一领导。

三十年代，左翼文化和文艺运动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心的上海，蓬勃发展，影响遍及全国；在日本、在南洋，也有不少左翼文化战士进行着革命文化和文艺活动。建国以来，有关左联和剧联、美联活动的史料，陆续有过不少介绍文章，而社联等则很少介绍。许多革命文献、资料、报刊历经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以至林彪、“四人帮”的销毁，留存绝少，为收集和整理社联史料增加了很多困难。我曾有机会向三十年代初参加社联的老同志请教，连当年筹备和参加过社联成立大会的老同志也已记不清社联成立的确切日子和最初参加社联的盟员。幸好，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过一批以文总、左联、社联为主的革命文化刊物，遂得以保存了不少的文

总、左联和社联的珍贵史料。

左翼文化刊物《巴尔底山》^①第一卷第五号（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和《新地月刊》创刊号（一九三〇年六月一日出版）上都曾刊登了署名“子西”写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的报道。

社联经过一段时间筹备工作以后，原定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生日（五月五日）举行成立大会。但因忙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筹备工作来不及，延至五月二十日才召开成立大会。成立大会在上海何处召开，至今没有发现文字记载。连参加筹备工作的王学文同志也已回忆不起。据《巴尔底山》和《新地月刊》报道，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有四十余人。当天参加成立大会的有：宁敦五、邓初民、吴黎平、钱铁如、熊得山、柳岛生（杨贤江）、林伯修（杜国庠）、朱镜我、蔡咏裳、王学文、董绍明等三十余人。公开列出姓名的有十二位盟员（包括报告筹备经过的潘汉年），其余因故没有列出。筹备委员会宣布开会后，推举宁敦五为主席，筹备委员潘汉年报告筹备经过，接着由左翼作家联盟代表田汉及“五卅”筹备总会代表和互济会代表致词。随后通过社联的纲领和组织，产生了执行委员会及基金委员会，通过组织编辑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国际及中国经济政治研究委员会和创办联盟机关杂志、出版有系统的社会科学丛书、中国经济研究丛书及研究刊物、联络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团体、领导国内各地文化运动、参加“五卅”筹备工作、起草“五卅”宣言等提案。由邓初民同志担任社联主席（见《战地》一九八〇年第四期上邓初民的回忆文章《沧桑九十年》）。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提出了明确的战斗目标和五项主要任务。这一纲领在《巴尔底山》第一卷第五期上只提到将于下

^① 《巴尔底山》是 Partisan 的音译，意即“袭击队”或“游击队”。

期(第六期)全文刊登。但《巴尔底山》第五期即被查禁,第六期就不及刊出。而《新地月刊》(实即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上却把社联纲领附录在那篇社联成立大会报道之后。以后,一九三〇年九月十日出版的左联机关刊物《世界文化》^①月刊创刊号,在“世界文化消息”的中国栏内《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现状》中,全文刊登了社联纲领。不久,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五日《社会科学战线》第一期上,又登出了用中、英、德三国文字发表的社联的纲领。

《纲领》对社联成立的目的与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在全世界革命斗争日益紧张,中国革命巨浪正在高涨之际,革命理论的研究与发挥,遂成为中国每个进步的社会思想家的切身的任务。‘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句名言,是我们所应当牢牢地记住的。在这样紧张的时期,中国的一切社会思想家,实在是负担着非常重大的责任。”纲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不仅限于理论,它的伟大的特点,还在它是和实际运动相联系的。理论与行动的合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谁要是空谈理论,而不作实际行动,那他就决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纲领强调了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

“纲领”提出了五项主要任务:

(一)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

① 《世界文化》是左联的机关杂志。早在左联成立后,就已确定要出版机关刊物。这在《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大众文艺》第二卷第四期、《沙仑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关于左联成立的报道中就都提到了。如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〇年四月出版)上就写明,“联盟成立之后,即已开始积极工作,如各研究会均已相继成立,并机关杂志不久即可出版,杂志名《世界文化》,代发行所为泰东书局。”《鲁迅日记》三月十四日记:“泰东书局招饮于万云楼,晚与柔石、雪峰、侍桁同往,同席十一人”,三月十七日记:“午后议泰东书局托办杂志事,定名曰《世界文化》”。都是有关洽商出版《世界文化》的事。但,后来情况有变化,泰东书局不肯出这类左翼杂志,一直延迟到九月十日才由左联用世界文化月刊社名义出版。